

卧榻之侧 众人鼾睡

积贫积弱 两宋梦断统一大业

宋朝立国不久，太祖赵匡胤曾在雪夜走访宰相赵普，赵普询问原因，太祖回答说：“吾睡不着，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未尝见卿。”后来又留下“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之语。宋太祖心心念念想统一南北。但终宋一朝，都未能实现这个夙愿。反之，卧榻之侧，鼾睡者众多。

当时，经历过五代十国的动乱，统一成了大势所趋。宋太祖和太宗也都下决心要统一天下，他们采取“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方针，先后征服了南方的后蜀、南唐、南平、吴越以及山西的北汉等政权，基本上统一了南方和中原地区。但是，在劲敌辽朝面前，却屡吃败仗。先有太宗高粱河之败，后来又有雍熙北伐的惨败，以至于在有可能取胜的情况下，真宗签订了澶渊之盟。可以说，宋朝统治者畏惧于辽朝的实力，连努力的勇气和决心也丧失了。他们不再锐意进取，而是“守内虚外”，一味采取守势，希望和谈的机会换来统治的安定。在后来的西夏、金朝面前，宋朝也始终未能取得绝对优势。宋朝曾人为地阻断和西夏的经济交流，加深了与党项民族

的矛盾。而西夏从澶渊之盟看出宋朝的软弱，在那之后的六七十年中，不断袭击和侵扰汉族农业地区。宋、夏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但在军事上总是宋军失利。范仲淹的“以和好为权宜，以战守为实事”的战略方针，没能得到赞同和实施，是造成宋军失利的重要原因。东北地区的契丹人崛起于北宋末期，1125年灭辽，不到9个月之后就分兵渡河南下，1127年的“靖康之变”，徽宗、钦宗被俘，北方陷入金朝统治之下。南宋和金政权对峙一个多世纪之久。当时有“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的诗句，反映了人民群众渴望统一的心情，但统治者沉迷于江南风物，在西湖歌舞中丧失了斗志。要追究起来，当然不止因为北方游牧民族军事实力强大，还须从北宋自身去寻找原因。在政治上，宋朝极力采取集权措施，“强干弱枝”，杜绝一切类似于“陈桥兵变”以及宰相、外戚或守官专政的机会。在军事上，强化禁军，弱化地方上的兵力，收回藩镇的兵权、财权、行政权，代以文官治理，取代武将，企图消灭唐末五代以来的地方军事割据；



杨家将是北宋对辽战争中涌现出来的武将家族。杨家将血战报国，他们的故事被广泛流传，反映了在当时民族战争的时代背景下，官方和民间的愿望和思想。

制又多次引发农民起义，“三冗”和每年缴纳给辽、西夏的岁币等，加重了财政负担，政府国库年年入不敷出。凡此种种，终于造成了北宋王朝的积贫积弱。历史也许有太多侧面了：岁币加重的是劳动人民的负担，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盟约的订立换来的即使是短暂的和平，仍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双方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在那个时代，杨家将抗辽的故事和岳飞抗金的故事被人民传唱，无疑反映了人民渴望统一和抗击武力侵略的心情；对外贫穷的宋朝，却滋养出中国科技、思想与文化的盛世。

聂爱玲(北京大学历史系)

悬疑

身为太子不得宠爱 即位月余魂归天国

红丸害死朱常洛



朱常洛画像

明光宗朱常洛被认为是一位不幸的皇帝，这位39岁便辞世的皇帝前20年是不受宠爱的皇子，后19年过的是战战兢兢的皇太子生活，在经历了短暂的一个月皇帝生涯之后便撒手人寰，遗留下疑云重重“红丸案”。其一生始终处于宫廷阴谋漩涡之中。因其父明神宗偏爱他的异母弟福王朱常洵，而他则成为文官政府的官僚士大夫们拥护、推戴的对象，双方展开了长达15年的拉锯战……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7月21日，神宗病逝。八月初一，朱常洛即位，宣布次年改元泰昌，仅仅过了九月初一，即告身死。对此，有人怀疑是郑贵妃暗中做了手脚，因郑贵妃命崔文升进药，且药不对症加剧光宗病情一事早已闹得沸沸扬扬，虽然导致光宗殒命的“红丸”是否与郑贵妃有关众说纷纭，但崔文升进药事则成为郑贵妃难以洗脱的疑点。

崔文升本是郑贵妃宫中的亲信太医。朱常洛即位以后，升崔文升为司礼监秉笔太医，兼掌御药房。朱常洛患病后，崔文升以掌御药房太医的身份向皇帝进“通利药”，即大黄。大黄的药性是攻积导滞，泻火解毒，相当于泻药，从而导致朱常洛一昼夜泻数十次，身体极度虚弱，处于衰竭状态。因此，官员们对于崔文升进药的资格和所进药物是否符合医学原理两点，对崔文升进行猛烈的抨击。朱常洛的生母王氏外家、原皇太子妃郭氏外家两家外戚都认为其中必有阴谋，于是遍谒朝中大臣，哭诉官禁囚危之状。在一片反对声中，崔文升被逐出皇宫。

到了八月二十九日，鸿胪寺丞李可灼说有仙丹要呈献给皇上。太监们不敢做主，将事情禀告内阁大臣方从哲。方从哲说：“依清仙丹，便不敢信。”接着，内阁大臣们进乾清宫探视朱常洛。朱常洛此时已着意安排后事，安排好一切之后，朱常洛问：“有鸿胪寺官进药，何在？”方从哲说：“鸿胪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轻信。”朱常洛自知命在旦夕，遂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命李可灼入宫献药。朱常洛服完红丸后，感觉还好，让内侍传话：“圣体用药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傍晚，朱常洛命李可灼再进一粒红丸。尽管御医们都表示反对，但是朱常洛坚持要再服一颗。于是，李可灼再让皇服用了一颗红丸。服后，朱常洛感觉安适如前，没有什么不良反应。然而，次日(九月初一)五更，朱常洛便死去。于是，廷臣纷纷议论，指定李可灼、红丸是致皇帝暴毙的罪魁祸首，而且还牵涉到方从哲。不过，平心而论，方从哲、李可灼对于朱常洛服药，本就是抱着试一试的希望，对于朱常洛的死并不负什么责任。后来，内阁大学士还将进药的前后始末详细地在给崇宗的奏疏中说明，才使方从哲摆脱了困境。

至于是否郑贵妃指使李可灼，虽有怀疑但无可查证，最终，方从哲被迫辞职，李可灼被充军，崔文升被贬放南京，此事不了了之。

欧洋/编

显示现世生活的一切美好享受

提香 赢得帝王把身躬

6月28日，名为《从提香到戈雅》的画展在中国美术馆举行，展品来自“世界四大美术馆”之一的西班牙普拉多博物馆，名作荟萃，画星云集。领衔的是意大利长卷画家提香(1485?-1576)。提香的生辰至今仍是个谜，文件记录是1482年，同时代的传记文学家瓦萨利的记载是1489年。提香在给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信中称自己生于1477年，这样算来他去世时寿享99岁。不过，提香一生爱财，信中的“老迈年高”可能是他向有“吝啬鬼”之称的菲利普索酬的手段。

无论如何，提香活到了耄耋之年，这样的寿数在世界画坛只有20世纪的毕加索、齐白石、张大千可以比拟，而他生前的高贵厚禄、荣华富贵可称空前绝后。幼年的提香只是生长在意大利北部山区小镇的一个不爱读书的顽童，少年时跟随着来到当时的经济与艺术的都会威尼斯学画，投在名家贝利尼的门下作学徒。日久，提香与同门师兄乔尔乔内成为莫逆之交。乔尔乔内生得一表人才，能诗善琴，风流不羁。提香着意模仿他的画风和为人，经常一同外出寻欢，也曾一起被老师逐出店门。到后来提香与乔尔乔内的画法已经难分彼此，索性合作，互署姓名。1510年，乔尔乔内不幸死于鼠疫，年仅33岁。

1516年老师贝利尼去世，提香即成为威尼斯画派的主脑。中世纪刚消散的威尼斯凭借深厚的商业传统，纵横海上，富甲一方。财富与商人、官僚喜爱非基督教的古代希腊、罗马充满激情与美感的神话题材。威尼斯画派重在人物形与质的饱满，肉体丰腴色彩细腻，情感外露古人今态。提香特别善于调和颜料，被誉为“色彩大师”，尤其喜用黄金般的华丽，世人欲横流的水域，妓业昌盛时青楼人物数以万计，画家们经常将名妓引入画中。美术评论家



会成为世界第一的画家。”

例如提香晚年的画作《忏悔的玛格琳达》，他已将金色运用得自然纯熟，肉感十足而张弛有度。玛格琳达就是圣经中皈依基督的妓女“抹大拉的玛利亚”，用妓女主角与威尼斯的情态颇为相合。这座物欲横流的水域，妓业昌盛时青楼人物数以万计，画家们经常将名妓引入画中。美术评论家

迟尔顿及这幅画曾道：“与其说这是个万念俱灰向往来世的苦行者，不如说更像一个爱情上暂时失意的少妇。”

提香的技法与声名与日俱增，1538年被举为威尼斯首席画师，后来还被封为侯爵。他是个纯粹的享乐主义者，住所如同宫殿，用度穷奢极欲。鄙夷他的贵族称他是“大自然在某个时候创造出最贪得无厌的人”。而他的艺术

造诣折服了教皇和各国君主，传说提香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作画时，皇帝曾为他拾起落在地上的画笔。此时中国正在明代，莫说皇帝为画师拾笔，皇帝和生母见面都是要行君臣之礼的。帝王为画师折腰的传奇不论真实与否，它广为流传的本身就预示出文艺复兴所开启的向往平等和人道的新时代。提香的胜利是艺术的胜利，也是人性的胜利。朱锞(首都博物馆)

三山五园与清代政局·之二

开清代园林之先河 创大清政治之传统

畅春园 康熙的决策和施政中心



康熙二十三年(1684)和二十八年(1689)，玄烨皇帝先后两次南巡，其间深为江南山水和园林所感染，返京后即命宫廷画师吴人叶洵在明代清华园旧址上仿江南园林建造皇家“御园”，以作“避喧听政”之用，这座园林就是后来的“畅春园”。

清代的畅春园位于清代南海淀大河北，即今海淀区北京大学西墙外畅春园宿舍一带。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推算，全国南北长约1000米，东西宽约600米，占地900亩(60公顷)。东至颐和园路、南至西四环路、西至玉泉河路西侧、东北至恩佑寺遗址。康熙帝曾亲自命名为“畅春园”，寓意“四时皆春”、“六气通达”。畅春园建成之后，康熙帝大部分时间驻跸于此，只有在

举行重大仪式的时候，才会回到紫禁城。康熙五十二年(1713)殿为园中正殿，是康熙皇帝会朝臣、听政理事之处，也即畅春园中最重要的“政治空间”。

东路“澹宁居”为主体建筑，前殿是康熙帝理政、选贤和引见之所，清代著名的宫廷画师荷兰人郎世宁就是在这里第一次见到康熙帝的；后殿为其读书之处，康熙曾在此与来华耶稣会士探讨天文地理问题，并在此演算西方算术和几何问题。清溪书屋为康熙帝宴寝之所，而他最后就逝世于此。可见，东路是康熙帝处理日常政务之地及“学习和生活空间”。

西路建筑均依园内的玉泉河而筑。其中，核心建筑为无逸斋，是大子和皇孙读书之所，

康熙时太子胤胤及后来的皇孙弘历(即乾隆)都曾在此读书学习。可见，西路是畅春园的“休闲娱乐空间”和“储才空间”。

畅春园开清代的园林之先河，并深深影响了其后的承德避暑山庄、圆明园、颐和园等园林。历朝清帝均效法康熙，在京城西郊建园听政，形成了清代的政治传统。作为帝国仪式与权威象征的紫禁城和作为帝国实际运作决策中心的西郊园林构成了大清帝国独特的“官苑体制”。

畅春园后毁于咸丰十年(1860)的英法联军战火，现仅存北京大学西侧门外的恩佑寺和恩恭寺山门遗址，在默默地向过往的人们讲述过往的辉煌与沧桑。

席东(北京大学历史系)

京华风物

太医院的“心理学”

大医院是为皇家服务的官方医学机构，集中了最权威的医典和最高明的大夫。大夫的高明之处不仅在于医术的神妙，还必须通达世情，熟读人心，掌握一门特殊的揣摩“心理”的学问，才能在富贵与险恶间容身。

医生自然要熟读医论、药典，但是大医在读书方面所下的苦功，为的不全是药到病除，更重要的是防备各种难测的考验。皇帝“金口玉言”，诊脉时一般不会向大医问话太多。而皇族中一些自负的亲王、贝勒，平日读了几本书，便耐不住要寻机显示一番，这种麻烦是免不了。诊病时他们冷不丁撩出不知从哪里看来的病理和方子，做考查式的提问，如果医生答不上来，说不清楚，就会被人轻视。

除了医书、药典，大医还要熟知朝廷典故。请脉时皇帝向来问话不多，但凡开言，对答必须合仪得体。清代的笔记小说里有这样一段故事，皇帝令大医近身诊脉，而大医在下俯首不动，一旁的侍卫问：“为什么还不请脉？”大医说：“龙袍在地上，小臣不敢向前。”皇帝听了十分满意，夸奖说：“他答龙袍在地上，不跪在地上，极有道理。”从此这名大医得到皇帝的信任。王公贵族的讲究要宽得多，问话也多不拘大礼，更需要灵活应对。例如问历朝大医院的医正都是何人，某某人学问如何，某人为皇上看病有什么情节、何等功过。回答不明白，就可能落个冒牌的名声。

前面提到的只算是大医“心理学”的基础，真正的“功夫”要在诊的过程中由医生自己参透，应付权贵必须投合其虚荣的心理。为王公、贝勒看病，最好说他的病征很像皇上某次的情况。给爵位稍低的贵族诊病，就说脉象颇似某王爷哪一次的病态。亲贵的小孩子得病，便讲病得如同某位太子前次一般无二。贵人们听说自家得的病与更高贵的人相同，自然极有面子，而案例从侧面又能证明该医生对于此种病症颇有经验。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对于贵族、官僚家的老人和妇女尤其难办。官僚往往级别越高，年纪越老，老人患了病动弹不得。室内光线多不明朗，认不清面目病征，舌苔吐了事，也不好劳动大驾出来细观。贵妇、小姐看病要顾及“妇道”，尊容难得一见，即是诊脉也要在手腕上敷一块手绢或者薄绸子，脉象受阻不易理清。所以，闻和问就十分重要，大夫要在很短的时间内问出症结，听出疾处，要掌握一定的“调查方法”。

开药方的难处丝毫不减，大医对付自以为是的亲贵还得迎合他们自负的心理。揣摩某公对某味药十分看重，买进方子，贵公便欣慰而生出信赖。其次，多用名贵药材，甚至加些人参炭、莱菔炭、珍珠粉，不能掉价。如此药方的效力自然高不到哪儿去。所以，贵人未必能颐养天年，不能怪医生们总拿“心理学”应付了事，此种“心理学”的病根原本生在受害者自己身上。书概

读史记

赵高使其客十余辈为御史，谒者、侍中，更往覆讯。斯更以其实对，辄使人复榜之。后二世使人验斯，斯以为如前，终不敢言，赐服。

——《史记·李斯列传》

李斯 功名富贵难始终

李斯对功名、权力认识得比较早。他年轻时在那里当小吏，看到厕所里的老鼠，吃的是脏东西，有人大经过，就惊慌逃跑；而粮仓中的老鼠，吃粟米住大屋，更不用担人心大惊悚，于是慨然叹息道：“一个人有没有出息，就如同老鼠一样，是由自己所处的环境决定的。”李斯很现实。他师从荀子，学成之后，认为只有秦国有可能一统天下，实现自己的才华和事业，就投到吕不韦门下，担任郎官。当时修建郑国渠的水利专家郑国，被发现是间谍。有人建议秦王把说客全都赶出秦国。李斯写了著名的《谏逐客书》，陈明利害，最终让秦王采纳了他的建议，也保住了自己的政治前途。李斯后来官至宰相，富贵至极。

但李斯最后选错了路。秦始皇死于路上，本来想扶苏继位，赵高决心改立胡亥。他去找当时掌握实权的丞相李斯商量。李斯不同意，赵高给了他几点理由：如果扶苏登基，肯定用蒙恬为丞相，你就会被免，而秦国历史上被免的丞相最后都被杀；你听我的计谋，可以永保富贵，“长有封侯，世世称孤”，否则“祸及子孙”。最后的话打动了李斯。

掌握朝政后的赵高为了自己政治生命的安全，对李斯无情打击，最终编织了一个谋反的罪名，将李斯腰斩。李斯如果坚持秦始皇的遗愿，立扶苏为帝，恐怕他的后半生不会被赵高整得那么惨。

王肖杰

本版投稿

bjcbdsb@sina.com